

## 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和国际维度审视

郭真 郑芳 石国进 尤琳

**【摘要】** 本文从历史和国际的维度,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考查了中国历史上曾错失过的三次战略机遇期,探究了正面典范——日韩成功利用的经验,以及反面教训——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阐明了党中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科学判断的客观依据,以及继续抓好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深远意义,旨在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进一步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关键词】** 重要战略机遇期; 科学发展观; 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1)04-0135-05

**【作者简介】** 郭真(1964—),女,山东烟台人,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专业技术大校,副主任,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和军事外交研究;郑芳,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专业技术少校;石国进,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专业技术中校;尤琳,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专业技术中校。

所谓“机遇期”,是指在一个时期续存的发展机会和有利条件,“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具有宏观意义和战略价值的重大契机,而“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则是指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能够迅速上升的关键时期。世界近现代史表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改朝换代常有,但机遇不常有。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就在于那几步:善于把握机遇,就能“得天独厚”,抢得先机,长治久安,甚至后来居上;不善抓机遇,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坐失良机,被淘汰出局;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会危机四伏。

早在十六大,党中央就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得出这样的正确判断:“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的基础上,做出战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综合研判:党中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科学判断的客观依据

转眼新世纪头10年已经过去,这一期间,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

多新情况新特点,但是这一判断依然是科学的。

(一)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当前的和平发展仍处于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中。

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合作与共赢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认识。在纷繁芜杂的国际环境中,虽然地区热点、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但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虽然围绕资源、环境、贸易问题的摩擦日益增多,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加大,我国倡导的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虽然少数国家与我国存在某些领土领海以及海洋权益争端,但周边安全环境总体平稳,我国同周边国家战略互惠、务实合作的关系仍持续发展;虽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等噪音不绝于耳,少数国家企图牵制中国发展,但各国与我经济技术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我国同各个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持续平稳发展。

(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但是社会大局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纵观国内,我党励精图治,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幅提升了综合国力,明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我国有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雄厚积累,有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未来发展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我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内需空间,使未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具有保证未来发展的制度优势;我国社会政治大局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认同,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显著增强,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当代科技发展也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机会。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科技创新上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达到了 4000 美元,实现了诸多历史性的跨越。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 二、以史为戒:曾经错失战略机遇期的反思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错失过三次战略机遇期,与工业文明和快速进步失之交臂,留给我们深深的遗憾。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出现在公元 15 世纪中期。当时,中西方文明中心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掀起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最早走向外部世界的是中国。<sup>①</sup>15 世纪初,中国就派出一支由朝廷官员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先后七下西洋,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海岸出发,向西穿越印度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这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抓住机遇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在“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明王朝漠视大航海的巨大商机和发展机遇,只是用财物换来他国的“臣服”。这种没有利益追求的航海最终因明成祖一道圣旨而终止。中国先是由皇帝下诏,命令以郑和为首的船队班师回国。后来当葡萄牙、荷兰和英、法等国从海路抵达中国东南海岸,俄罗斯从陆路行进到中国北部边疆时,中国政府却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走向了内向型发展之路。而与之相对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各国紧紧抓住这次机遇。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随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

期,创造了利用大航海大发现的主观条件——承认和支持经济利益诉求的社会体制结构,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②</sup>一下就把大清王朝甩到了后面。对此,马克思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sup>③</sup>这段历史大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

第二次战略机遇期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当时,那些紧紧抓住第一次战略机遇期的部分欧洲国家,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中国。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生长为国家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当时的中国和邻国日本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对于中国来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工商皆本”思想正在蔓延。应该来说,若能好好利用西方科技和国内思想转变之机,中国还是有机会与西方同步近代化。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果断地实行明治维新,从而成为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决车的幸运者,在短短几十年迅速崛起,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则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缓慢推进,最终错过了这次难得机遇,在帝国主义的大炮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发生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时代。当时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再加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从而给世界各国也给中国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本来,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发展路线和目标,我国已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复兴出现了曙光。然而,这一次机遇没有完全抓住,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复出现严重的失误,使八大的路线在后来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文革”一场动乱,使中国的经济再次停滞和倒退,不仅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被原来与中国经济差不多水准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超出。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才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之道。

### 三、以国为鉴:用好战略机遇期的“他山之石”

国际经验显示,人均 GDP 越过 3000 美元大关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国内矛盾容易加剧,如果能够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社会持续发展,就能跃入发达国家行列;反之,极易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泥淖。这个时期是重大的机遇,也蕴含严峻挑战。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的起步,借鉴别国经验教训,更好地规划措施蓝图,我们才能抓住和用好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起飞。

#### (一)正面典范:日韩成功利用的经验

现在全球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少数,高收入国家也是少数,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等收入这个层次,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它们是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的正面典范。

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迹”的领跑者。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日本: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到 70 年代、80 年代,日本出口行业中机械行业占比大幅上涨,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也因此大幅提高,机械电子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80 年开始,日本政府觉察到,依靠基础工业延续的经济奇迹不会再出现,产业结构应转向以最终消费产业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成功的产业升级,进入了具备完全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者”行列。

韩国:从保护战略产业到鼓励创新活动。韩国上世纪 70 年代的“汉江奇迹”主要也是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

它保护措施等,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韩国将产业技术开发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1986 年制定“面向 21 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年出台科技发展 15 年规划,明确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逐步转到企业;制定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措施的实施。投资方向也从轻工业和成熟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

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也有密切关系。<sup>④</sup>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实施。日本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之前,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基尼系数一度高达 0.47。但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收入差距问题得到明显改善。韩国:重视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韩国之所以能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把总体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重视农村地区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 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 年至 1978 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从日韩的成功,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下经验:首先,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是影响人均 GDP 增长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农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日韩两国已经探索出了清晰的路径。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工业化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容易扩大,社会越不容易稳定。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发展就无从谈起。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控制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国民在面对经济发展机遇时拥有大致均等的机会,社会因此相对稳定。

最后,政府在跨越过程中始终处于强势的引导地位。日韩两国的历次产业战略调整和转型,几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订政策并加以推动。一方面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

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

## (二)反面教训: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危机频发则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有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有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sup>⑤</sup>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严重。资料显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正规就业大幅缩减,非正规就业比重显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规部门(自谋生计者、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61%。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职业分层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虽然在经济扩张周期中有所缓解,但是程度依然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率1990年达到48.3%,创历史纪录。至2008年拉美贫困率降至33.2%,但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贫困率再度反弹。

反思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出现的严重失衡,可以总结如下归因:一是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拉美的失误在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反而继续维持着“举债

增长”的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sup>⑥</sup>

二是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存在“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在拉美国家作为“精英意识形态”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要求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经济财富的这种集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的极端情况必将导致中产阶级的流失。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对经济所具有的“稳定器”作用在拉美几乎丧失。选举周期对预算执行的影响、各级政府之间对财政安排的博弈等都对财政政策制定产生作用。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制度框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债台高筑,顺周期性最终导致危机和经济崩溃。当高失业率、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情况更糟。因此,在政策不能提供稳定预期的经济环境中,社会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四是国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走向极端,公共政策难以发挥效果。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例如,特殊的关税、税收、货币等,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阻碍市场运作效率,滋生寻租、投机和腐败行为等。而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时期,市场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作用被极度削弱,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此时日渐式微的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 四、牢牢抓住:继续抓好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的深远意义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关键期。能不能牢牢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推动科学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 (一)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强调要牢牢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充分表明我们党政治上的清醒和成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只有充分认识我党我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培育忧患意识,进一步抓好和用好这一机

机遇,正所谓“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我们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会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是推动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两型社会,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只有这样,我们就一定会把机遇变成美好未来,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然要求。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攻坚战是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举措。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继续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更加有效地拓展内需空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实现总需求结构的调整;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技术要素的水平,依托科技进步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技术,促进环保产业新发展,提升科技服务于民生的能力,着力突破改善民生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难题。

(四)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战略前提。

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和用好重要机遇期就是要在“十二五”甚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真正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共同愿望;切实加大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在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真正让老百姓“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进一步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真正实现“有教无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要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正是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集中体现。

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军建设的重要使命。胡主席提出军队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支同我国地位相称、同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在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影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维护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挑战。我军既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积极应对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对此,党和人民要求我军一方面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履行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根本职能。另一方面还要自觉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必须自觉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良性互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积极主动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实现军队跨越式发展,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总之,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进一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积极做好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高标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历史和国际维度昭示:处在“拐点”的中国,必须汲取自身历史留下的反思和他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按照胡主席的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埋头苦干、发展自己,继续抓好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迎接更加辉煌的明天!

#### 注 释

- ① 刘德喜:《中国错失的三次战略机遇期》,载于《四川统一战线》2008年第1期。
-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716页。
- ④ 张亚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经验》,载于《人民论坛》2010年第7期。
- ⑤ 李建良:《从“拉美陷阱”看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于《桂海论丛》2005年第3期。
- ⑥ 成思危:《中国应警惕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载于《人民论坛》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 赵长峰]